

辽大丞相汉官耶律隆运

郭 康 松

辽朝和西辽是以契丹族贵族为主体，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所建立的朝代。在两辽长达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汉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始终起着重大的作用。而辽景宗耶律贤、圣宗耶律隆绪时期的大臣汉官耶律隆运所起的作用最为显著、最为突出。他在辽朝的地位之隆也是无人可以比并的。

一

耶律隆运，汉族人，本姓韩，名德让。生于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四年（941年），其祖、父均为辽朝大官。耶律隆绪统和十九年（1001年），赐名德昌；二十二年（1004年），赐姓耶律；二十八年（1010年），又赐名隆运。耶律贤时期，他在政界就小有名声，“以谨飭闻，加东头承奉官，补枢密院通事，转上京皇城使，遥授彰德军节度使”；因有战功，“拜辽兴军节度使，征为南院枢密使”①。

耶律贤死，耶律隆绪尚幼，承天后萧绰秉政，由耶律隆运总领宿卫事。“统和元年（983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986年），……加守司空，封楚国公”②；后又封楚王。

十二年（894年），重臣“室昉致政，以隆运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赐兴化功臣”。后来又“加守太保，兼政事令。会

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薨，诏隆运兼之。久之，拜大丞相，进王齐，总二枢府事”③。权位达到顶点。

二十二年（1004年），改封晋王，“赐田宅及陪葬地”④。“及薨，帝与后、诸王、公主已下并内外臣僚制服行丧，葬礼一依承天后故事。灵柩将发，帝自挽辒辌车哭送。”⑤

他的一生，不断升官进爵。他深得耶律贤，特别是萧绰和耶律隆绪的信任。真是位极人臣。即使亲王也无可匹敌。死后赠尚书令，谥“文忠”，这是历代封建皇朝的臣下最不易得、最为荣耀的谥号。“闻其谥而知其行”⑥，由他的谥号可知他非一般的臣僚可比。

更有甚者，是耶律隆运有其文忠王府。辽朝制度，“天子践位置官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官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⑦。只有皇帝以及最有势力的皇后和个别皇太弟才有权享有官卫。辽朝历史上除了帝、后十一官和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的敦睦官之外，就是大丞相耶律隆运拥有的文忠王府了。文忠王府的规格并不亚于十二官，甚或驾而上之。“十二官一府，自上京至南京总要之地，各置提辖司。重地每官皆置，内地一二而已。”在各官并未遍设提辖司的南京、西京、奉圣州、平州、中京、上京，却都设有文忠王府提辖司；而上京并未设各官提辖司，仅设有文忠王府提辖司⑧。耶律隆运在辽朝朝廷中，作为一个汉官，其权位之高、气势之盛可见一斑。

二

耶律隆运当权于辽朝中期的耶律隆绪时，这不是偶然的。这是辽朝历史发展的合理产物；是由于耶律隆运出身于契丹族，而韩氏家族

及其本人与后族有特殊的关系，又加上他本人确有政治、军事才能，而这些才能又在当时得以很好发挥的必然结果。

耶律隆运的当权，是辽朝历史发展的合理产物。从太祖耶律阿保机到景宗耶律贤，数十年间有了很大变化，耶律贤时期已非开国之初的辽朝所可比拟。

第一，农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契丹族最初是以畜牧、田渔为稼穡，“其富以马”、“马逐水草，人仰湟酪”^⑨的游牧民族。随着不断发动的战争，契丹族贵族取得了大片农业生产区，掠入了大量的汉族人民，使他们安居下来，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契丹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也渐习农桑。通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他们不仅提高了辽朝统治地区农作物的产量，而且扩大了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以后，辽朝“益富饶矣”^⑩。燕云十六州封建的农业经济愈来愈发挥作用以及辽朝统治下的其他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有政治上的代表，特别是汉官中的代表。

第二，封建的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农牧业的结合。辽开国之初，各族“种类蕃多，其心不一”^⑪。辽统治者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⑫的“因俗而治”的方针，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畜牧业跟随农业之后，发展了封建经济，这使契丹、汉两族人民经济生活逐步向着趋于一致的方向发展。两族人民在劳动中不断相互了解，相互交往，使民族歧视渐趋减轻。萧绰把原来“契丹与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的民族歧视政策，改为“一等科之，……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以及统和年间“诏……若奴婢犯罪致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⑬等，是对减轻民族歧视在法律上的肯定。

第三，封建化的加快和中原文化浸染的加深。由于封建经济的繁荣，

加快了辽朝统治地区封建化的进程。而早就开始了的大批汉人的涌入，和辽、五代以及辽、宋之间的和平与非和平的交往，带来的是中原文化的不断北来。契丹族统治阶级中一大部分人，景仰中原的儒家思想，从而使他们在思想意识上与汉族知识分子渐趋一致。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不断提高，许多汉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进入辽朝政界的中、高级领导阶层。如张砺、邢抱朴、马得臣、刘慎行、王继忠、室咏^⑭等。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大量地进入领导阶层和汉官地位的日益提高，已是耶律贤、耶律隆绪时期的一大趋势。耶律隆运正是这一历史潮流下的必然产物。

耶律隆运的祖、父两代都是辽朝大官，这是他进入辽朝政界高级领导集团的必要条件。

他的祖父韩知古，蓟州玉田人，有智谋胆识。辽太祖阿保机占领蓟州时，为耶律阿保机所俘掠，后来很赏识他，使他参与谋议。神册初年，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之职，很得信任，又“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辽朝开国未久，“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⑮。不久，拜左仆射，与康默记率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他是耶律阿保机时期的重要文臣，曾受命“建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⑯。他为帮助契丹族贵族成功地统治汉族及其各族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霸州），命韩知方（古）择其处。”^⑰他是耶律阿保机的佐命功臣之一。契丹族贵族正是得到韩知古等汉族知识分子“教以文法”，才“由是渐盛”起来的^⑱。

耶律隆运之父韩匡嗣，即韩知古之子。韩匡嗣凭借其父传下的基业，初为太祖庙详稳，耶律贤时拜为上京留守，不久又改为南京留守。保宁末年，以留守摄枢密使，后遥授晋昌军节度使。乾亨三年（981年），

改西南面招讨使。死后追尊为尚书令。韩匡嗣已有不小的地位与势力，曾先后封为燕王和秦王。皇族“宋王喜隐谋反，辞引匡嗣”，但穆宗耶律景“置不问”。耶律贤时，他误以耶律虎古所说“宋人必取河东”的话不可信，而未及救北汉之败亡，继而在满城之役相信宋兵的诈降，指挥失措，被打得大败，罪当论死，也仅仅被“杖而免之”^{①⑨}。由此看出他是受到皇帝的极端亲信的。

韩知古、韩匡嗣父子的迭为大官，为耶律隆运进入高级领导阶层打下了基础。其一，耶律隆运生长于这样的汉官世家，他才能够很方便地见习为官之“道”，才能够研习中原文化，熟习中原的典章制度，这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是有很大用处的。其二，辽朝当时尚未实行科举取士，要想进入政界就只有、也正好通过祖、父荫庇，渐次提拔。其三，帝、后对他祖、父的信任，也自然转为对他本人的信任。其四，韩匡嗣在世时，耶律隆运就已经是彰德军节度使，他可以借助于他父亲而施展他的才能。他曾经“代其父匡嗣为上京留守，权知京事，甚有声。寻复代父守南京，时人荣之”^{②⑩}。这不仅为他被皇帝赏识提供了条件，也为他在臣僚中和社会上造成了声誉。

他与后族的特殊关系和当时的形势，更为他升迁到丞相之位创造了条件。契丹族的“姓氏止分为二，耶律与萧氏而已”^{②⑪}。在辽朝，耶律氏世为皇族，萧氏世为后族。而从韩知古开始，韩氏家族就与后族有着特殊的关系。到了耶律隆运，这种关系一直保持着，而且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韩知古得以参政就与淳钦皇后述律平有关。

“太祖平薊时，知古……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后来嫔，知古从焉，未得省见。久之，负其有，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资用，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因间言，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

参谋议②”。

如果说韩知古得益于后族还是间接的话，那么韩匡嗣得益于后族就明显不过了。“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后来他在满城之役指挥失措，“仓卒谕诸将无当其锋。众既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弃旗鼓遁，其众走易州山”。这使得耶律贤大为震怒，列举了他的五大罪状，“促令诛之”。在这一关键时刻，“皇后（萧绰）引诸内戚徐为开解，……乃杖而免之”③。在龙颜大怒之时，皇后、内戚等为他开脱死罪，可见他们非一般的臣主关系。

耶律隆运正是赶上了耶律隆绪尚幼，萧绰秉政这个时机，利用太后、皇帝对他的无比信任，在辽朝一展宏才的。萧绰倾向中原文化，主张革新，是辽朝一立有才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她摄政时，大胆提拔、使用汉官，进行封建化的改革。这样，耶律隆运就成为她最重用的汉官。关于耶律隆运与萧绰的个人关系，旧史中曾经有一些说法。例如说：萧绰“与耶律隆运通”④。而另一说法说得更为具体：

“后幼时，常（尝）许嫁韩氏，即韩德让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妇于萧氏，萧氏夺韩氏妇以纳之，生隆绪，即今虏主也。耶律死，隆绪尚幼，袭虏位。萧氏少寡，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乃私谓德让曰：‘吾常（尝）许嫁子，愿谐旧好，则幼主当国，亦汝子也。’自是，德让出入帷幕，无间然矣。”⑤

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容另文讨论。我觉得，虽然他与萧绰的关系不一般，但主要还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关系仍然主要是政治关系。萧绰肯定是看到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有心借助于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他也看到了她的雄才大略，也想依托于她来施展自己的抱负。

《辽史》是这样评价萧绰的：“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⑥

她与耶律隆运在政治上的合作，臣主相得益彰，对辽朝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②7}耶律隆运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他与后族以及萧绰本人的关系而大展他的才略的。

三

耶律隆运对辽朝历史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谋远虑，机智灵活，及时帮助萧绰立梁王耶律隆绪为帝。

“景宗大渐”，耶律隆运“与耶律斜轸俱受顾命，立梁王（耶律隆绪）为帝，皇后为太后”^{②8}。当时的情况是“太后年方三十，诸子尚幼，外无亲援，雄杰角立”^{②9}。如果不解决好皇位继承问题，就会导致统治集团的不稳定。“时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内外震恐”，在这种形势下，“隆运不俟诏，密召其亲属十余人并赴行帐……隆运请于后易置大臣，敕诸王归第，不得私相燕会，随机应变，夺其兵权。时赵王等俱在上京，隆运奏召其妻子赴阙。景宗崩，事出仓卒，布置已定，乃集番汉臣僚，立梁王隆绪为帝，时年十二，……仍尊后曰仁慈翊圣应天皇太后”^{③0}这表现了他的胆识与计谋。由于他事先有准备，措施得力，很好地解决了继位问题，避免了皇族内部的纷争和内战的爆发。萧绰摄政，面临着“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等问题，就重用耶律隆运、耶律斜轸等“决大政”，并“委于越休哥以南边事”⁽³¹⁾。这样，就形成了以萧绰为首，以耶律隆运、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为骨干的核心力量。耶律隆运由于有策立之功，更成为辽朝朝廷的决策人物。

二、娴于军马，能守善攻，军功卓著，为辽朝疆域的稳固作出了贡献。

耶律隆运虽然是汉人，但他是辽朝统治地区的汉人，特别是辽朝世

代代汉族大官之家的后代。他生长于契丹族贵族熏陶之中，深受契丹族那种骠悍雄武之风的影响，吸取了契丹族能征善战的长处。耶律贤时期，

“宋人取河东，侵燕，五院讹详稳奚底、统军萧讨古败归，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耶律隆运坚守城池，稳定了人心。他“登城日夜守御，援军至，围解”（32）。在高粱河之战中，宋军失利败逃，他不拘泥于兵法所说“穷寇勿追”的戒律，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所杀甚众，获兵杖、器甲、符印、粮饩、货币不可胜计。”耶律贤以耶律隆运等“能安人心，捍卫城池，并赐诏褒奖”（33）。统和初，“率师伐宋，围沙堆，政乘夜来袭，隆运严军以待，败走之”（34）。

他还多次随耶律隆绪、萧绰出征，每次都是战果累累。统和四年（986年），“宋遣曹彬、米信将十万众来侵，隆运从太后出师败之，加司空，封楚国公”（35）。统和六年（988年）十一月，耶律隆绪

“诏诸将备攻具。庚寅，驻长城口，督大军四面进攻，士溃围，委城遁，斜珍招之，不降，上与德让邀击之，杀获殆尽，获者分隶燕军”（36）。二十二年（1004年），“从太后南征，及河，许宋成而还”（37）。直到二十九年（1011年），七十一岁高龄的耶律隆运还参加了耶律隆绪对高丽的军事行动。

他的这些活动固然给对方以及辽朝统治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也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38）“每一次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

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39）耶律隆运虽然是一位具有相当的中原文化素养的汉官，但他参予进行的征伐战争仍然是以较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民族的战争，其结果自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由于俘掠了大批的汉人，由于这些汉人和大量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涌入了辽朝统治地区，这就改变了契丹族的许多原有习性。他们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民族心理、社会心理上，都在渐渐向着中原地区趋近，向着中原地区悠久的封建文明趋近。同时，这种征战又巩固了辽朝统治地区，有利于这一地区内的各民族共同发展；这又在我国的东北部、北部和一部分西北部，进一步实现了地区性范围内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又为全国性的重新大一统奠定了基础。另外，在辽、宋双方的相互激荡中，双方的力量相互消长，终于形成了大体上的势均力敌的局面，澶渊之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经过辽、宋双方的努力而结成的。

三、固结盟好，恪守盟约，维护辽宋边界的和平。

《辽史》谈到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耶律隆运参予的南征结盟时，只用了十二个字：“从太后南征，及河，许宋成而还”（40），没有过多的叙述。但是，“许宋成而还”一句的“许”字透露出了信息，耶律隆运在这次结盟之事上是很积极的。还可以根据其他的材料以及他当时的职位，来窥探他在这一大事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契丹国志》的作者认为，耶律隆绪“年方幼冲，母后侵政。事归当璧，元辅专功。澶渊之深入，盖其母后与权臣之谋，非圣宗本意也”（41）。这里的“元辅”，“权臣”无可怀疑地是指耶律隆运。他的许多政见与萧绰一致，在南伐与结盟上也不例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使曹利用到契丹军营议和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曹利用自天雄赴契丹寨，见其国主、君臣与其主重行别坐，

礼容甚简。以木横车輓，上设食器，坐利用车下，馈之食，共议和好事。”（42）

《辽史拾遗》卷7《圣宗纪》转录苏辙的《龙川别志》，与上述记载小异而大同：

“兵始交而毙其贵将，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遣供奉官曹利用使于兵间。利用见虏母于军中，与蕃将韩德让偶坐驼车上，坐利用车下，馈之食，共议和好事。”

这些材料充分地说明，耶律隆运是这次议和的主要赞助者与和谈的重要参加者，并在达成协议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结盟之后，他也一直是恪守盟约的，为辽、宋之间的和平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隆运自为相以来，结欢宋朝，岁时修睦，无少间隙”。（43）宋朝方面对耶律隆运之死的反应，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他在这议和一事上的态度，在恪守盟信、维护和平上所作的努力，同时，也显示宋朝方面的人们心目中他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他的品评是怎样的。

“边臣奏韩德让死，上（宋真宗赵恒）曰：‘德让颇有智谋，专任国事。今既丧国母，德让又死。臣佐中未闻有其比者。’王钦若曰：‘国主懦弱，自今恐不能坚守和好。’上曰：‘朝廷终将待以诚信，彼之部族亦将顺从也。’”（44）

王钦若的忧虑不是庸人自扰，而是有一定道理的。耶律隆运这样一位总揽朝纲、力主和议的大臣死去之后，辽朝方面守旧势力是有可能随时发动对宋的战争的。

辽、宋和议，使辽、宋人民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有利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宋朝方面年年输与辽朝方面大量银绢，这不仅更加充实了契丹族贵族统治集团的府库，而且刺激了辽朝封建经济的繁荣发展，加速了辽朝的封建化进程。双方使臣的频繁往来，加深了南北两朝朝野

的相互了解，有利于契丹族等族对中原文化的进一步学习与吸收，也有利于中原地区广大人民逐渐熟悉和接受契丹族的某些草原文化。

四、重视农业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发展辽朝经济。

契丹族本来几乎全部从事畜牧业，仅有少许农业生产。在一部分中原地区归属辽朝统治，以及大批汉民涌入辽朝统治地区后，农业生产的比重愈来愈大，粮食除自给之外，有时尚有剩余。“保宁七年（978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正如《辽史·食货志》所说，“非经费有余，其能若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地改变着契丹族的食物结构。契丹族贵族在接待宋朝来使时，就“具蕃汉食”，以招待客人，“汉食贮以金器，蕃食贮以木器”（45）。汉食（主要是粮食制品）与蕃食（主要是肉、乳制品）具有同等的地位。契丹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逐渐有较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统和三年（985年），
“帝尝过^宋薅城，见乙室奥隗部下妇人迪鞞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割”（45），便是一例。

统管全国政务的大丞相耶律隆运，对发展农业生产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的。辽、宋双方曾经在边界上拉锯式的互相骚扰，必然造成某些耕地破坏，农业减收，农民散亡，致使有田无人种，有稼无人获。针对这种情况，耶律隆运采用了相应的应急措施。统和四年（986年）八月

“乙巳，韩德让奏宋兵所掠州郡，其逃民禾稼，宜募人收获，以其半给收者，从之”（47）。这样，减少了粮食的浪费，使成熟了的禾稼及时得到收割，利国利民。在封建制度下，农民只有附着于土地，与土地相结合，才能维持再生产。农民离开土地，与生产衰败，经济残破互为因果。这还会给封建统治秩序造成不安定的因素。而在当时，辽朝有的地区，由于战争，灾荒造成农业歉收，农民生活无着。“家食（贫）者全亏种植，多致流亡。”（48）。于是，耶律隆运“上言，山西四州数被

兵，加以岁饥，宜轻赋税以来流民，从之”，又“以南京、平州岁不登，奏免百姓农器钱，及请平诸郡商贾价，并从之”（49）。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保证了基本生活，使农民回到自己的家园。减免赋税是否能真正贯彻到底呢？地主、贵族总是想加紧对农民的剥削的。朝廷减免的赋税，在不少情况下得利的很可能是地主、贵族。对此，耶律隆运又上言“燕人挟奸，苟免赋役，贵族因为囊，可遣北院宣徽使赵智戒谕之，从之”（50）。他所作的这方面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在他执政时，还开垦了大量的荒地，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如统和六年（988年），“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给牛、种谷”（51），鼓励、扶助这些农民开垦新农田。

由于耶律隆运等施政比较有方，措施比较得力，大片的新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农民交租纳税之后，食用尚有剩余。统和十三年（995年），“诏诸道置义仓”。义仓是在丰年的“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寺仓，社司籍其目。岁俭发以振民”（52）的。这样，就增强了战胜自然灾害、继续发展生产的能力。农业与畜牧业的并行发展，构成了辽朝经济的主要内容。农业为畜牧业提供了饲料，畜牧业又为农业提供了畜力、肥料。农业又为手工业、商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商业、手工业又反过来服务于农业。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耶律隆绪时期的经济达到了辽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辽朝这一时期在官制、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变化，都与耶律隆绪。耶律隆运等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分不开。“名僧硕士，相与探索古文，穿贯线之花，翻多罗之叶，镂板制序，垂于永久。”（53）像《龙龕手鑑》等学术著作的编撰与印行，都发生于耶律隆绪时期，就不足为怪了。封建制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辽朝统治地区封建化的进程。

五、克尽大臣之职，团结蕃汉臣僚，荐举贤能，形成了较为清明的

政治局面。

“进贤辅政，真大臣之职”（54），这是承天后萧绰在耶律隆运上表请求任贤去邪时，嘉奖他的一句话。其实，他在团结蕃汉臣僚上，同样值得嘉奖。象他这样的一人之下（实为两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决策人物，要在处理政务中能够得心应手，团结一大批官员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大胆提拔、起用有才干的人，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积极性，才能把事情办好。耶律隆运与室昉、耶律斜軫“相友善，同心辅政，整顿蠹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敦法度修明，朝无异议”（55）。当时室昉是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与耶律隆运很为要好，很赏识他，曾经于统和九年（991年），“荐韩德让自代”（56）。这样，在高级领导层形成了统一的步调，一时政治颇为清明，朝廷之中颇有一番新的气象。在此同时，耶律隆运还是提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如：

汉人邢抱朴，“性颖悟，好学博古，……以枢密使韩德让荐，按察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大协人望（57）”。

契丹人耶律“敌鲁精于医，察形色即知疾源。虽不诊候，有十全功。统和初，为大丞相韩德让所荐。官至节度使（58）”。

“萧合卓，……统和初，以谨恪，补南院侍郎。十八年（1000年），北院枢密使韩德让举合卓为中丞，以太后遗物使宋”。他还“明习典故，善占对”（59）。

“耶律世良，……才敏给，练达国朝典故及世谱。……时北院枢密使韩德让病，帝问：‘孰可代卿？’德让曰：‘世良可。’北院大王实鲁复问北院之选，德让曰：‘无出世良。’统和末，为北院大王。”（60）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耶律隆运选拔、荐举的人之中，有好学博古

者，有精通医学者，有谨恪、善占对者，有练达国朝典故及世谱者；有汉人，有契丹人。可谓不拘一格。而这些被提拔、推荐者，无论是干那一项工作的，都做得很出色。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他提拔、荐举人才是以贤能为标准的，他对乌不吕的态度就是如此。

“乌不吕，……尝与义直不相能，因曰：‘尔奴才，何所知？’义直讼于北院枢密使韩德让。德让怒，问曰：‘尔安得此奴也？’乌不吕对曰：‘三父异籍时亦易得。’德让笑而释之。”

“及德让为大丞相，荐其才可任统军使。太后曰：‘乌不吕尝不逊于卿，何善而荐？’德让奏曰：‘臣忝相位，于臣犹不屈，况于其余。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镇抚诸蕃。’太后从之，加金紫大夫、检校太尉。”（61）

随着中原文化侵染的加深，封建化的加快以及汉官势力在辽朝内的增长，有更大一批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想进入领导阶层。怎样才能更好地把这一批人笼络进来，以巩固辽朝的统治呢？契丹族贵族子弟的晋升之阶是“世选”，“百官择人，必先宗姓”（62）。而汉人却很少有受父、祖之荫而做官的机会。于是耶律隆运推行中原地区的科举制度，使一批汉族地主阶级士人进入统治阶层。统和六年（988年），“诏开贡举，放高举一人及第”（63）。辽朝统治地区采用这一选官方法，是人事制度的一大进步。

对于在职的官吏，他也很注意考察。在封建社会里，官吏贪赃枉法所在多有。他发现之后，就上书“奏三京诸鞠狱官吏，多因请托，曲加宽贷，或妄行撝掠，乞行禁止，上可其奏”（64）。他的哥哥韩德源“性愚而贪”，“以贿名”，他也曾经“貽书谏之”（65）。

耶律隆运在用人上所作的这些努力，既是辽朝统治地区封建化的一

个重要内容，又对当时的封建化的进行起到了促进、保证作用。在基本上唯才是举的政策下，大量有才能的赞成封建化的蕃汉官员得到提拔，在科举取士中，一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辽朝统治阶层。他们是封建地主、牧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制定和推行着有利于封建地主、牧主阶级利益的政策，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对于那些守旧的契丹族贵族和奴隶制成分说来，是一种强大的冲击波，而这种冲击波的主要发射人之一就是耶律隆运。虽然在他死后，辽朝曾经一度出现了皇太弟耶律“隆庆桀黠，国人多附之”（66）的不安定局面，但是，唯才是举政策和科举取士的产物——大量的赞成封建化的契丹、汉两族官员，如耶律世良、张俭等，继续推行耶律隆运的政策，拱卫皇权，使得耶律隆庆等未能翻起大的波浪。在封建经济不断发展这一原动力的推动下，封建化在持续稳步地向前进行着。

四

当然，耶律隆运还远非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完美无缺的人物。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有他的一己之私。耶律虎古就是因为耶律隆运对他的私忿而被冤杀的。“统和初，皇太后称制，召（耶律虎古）赴京师。与韩德让以事相忤，德让怒，取护卫所执戎杖击其脑，卒”（67）。耶律隆运击杀耶律虎古，除“以事相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尽管从其它记载来看，耶律隆运的度量是较大的，但他击杀耶律虎古，当与他的父亲韩匡嗣有关。《辽史·耶律虎古传》说：

保宁十年，耶律虎古“使宋还，以宋取河东之意闻于上。燕王韩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诸僭号之国，宋皆并收。惟河东未下。今宋讲武习战，意必在汉。’匡嗣力沮乃止。明年，宋

果伐汉。帝以虎古能料事，器之，乃曰：“吾与匡嗣虑不及此。”授涿州刺史”。

《辽史·韩知古传》附韩匡嗣传说。

“时耶律虎古使宋还，言宋人必取河东，合先事以为备。匡嗣诋之曰：‘宁有是！’已而宋人果伐太原，乘胜逼燕。……匡嗣仓卒谕诸将，无当其锋。众既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弃旗鼓遁，其众走易州山……。

“帝怒匡嗣……促令诛之。皇后引诸内戚徐为开解，上重违其请。良久，威稍霁，乃杖而免之。”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耶律虎古与韩匡嗣是结下了怨恨的。也许，韩匡嗣的“沮”与“诋”有更深藏的背景，无法详知。我们能肯定的是，因为耶律虎古的预言是正确的，韩匡嗣没有听从，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被打得大败，差一点受到耶律贤的处罚而死。如果没有耶律虎古的那一预言，他就可以以宋兵突袭无备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败退。耶律贤在数落他的罪责时，有“尔违众谋”、“守御弗备”（68）这两条。耶律隆运受了儒家的“父之仇，弗与共戴天”（69）思想的浸染是很深的，连其中的坏东西也学得很到家。同时说明耶律隆运置身于法律之上，杀死一个契丹族贵族，却可以逍遥法外，他的权势是炙手可热的。

耶律隆运在室昉和耶律斜轸死后身兼数职，“专权既久，老而多疾”（70），无暇顾及多种政务，官僚作风所在难免。因此，并不是每一个部门都掌管得很好。“韩知认知北府，职多废旷。”（71）不过这似乎只是耶律隆运许多政绩之中的一个瑕疵吧。

五

耶律隆运以其强有力的政治手腕和颇为赫赫的军功，在辽朝朝廷中

几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他死后，各方面的不同反映很能说明这一点。前面讲过，他死后，宋朝大臣担心辽朝不能保持盟好。宋朝方面另有一些人认为辽朝失去他，如去脊梁，想乘机进攻辽朝，为此宋真宗赵恒不得不“诏河北、河东缘边安抚司应近边不逞之辈，有妄言惑境外者，严加捕诘”（72），以免挑起事端。辽朝内部，在他死后，“契丹主弱，……其弟隆庆尤桀黠，众心附之”（73）。耶律隆庆“又缮甲兵，遣亲信以私书交结贵臣。隆绪尝诏之，辞以避暑不至。其亲信录其书抵雄州。且言隆绪不能敦睦亲族，国人皆思归汉”（74）。宋朝方面得到的消息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是足以从反面证明了耶律隆运在辽朝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他同时代的赵恒说：“德让颇有智谋，专任国事。……臣佐中未闻有其比者。”（75）

《辽史·耶律隆运传》说，他“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
“在统和间位兼将相，其克敌致胜，进贤辅国，功业茂矣。”

《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说，他“性忠愿谨慤，智略过人”。孜孜奉国，知无不为，忠孝致诚，出于天性。”“自为相以来，结欢宋朝，岁时修睦，无少间隙，帖服中外，靡有邪谋。”“古今天下有权臣，有重臣。权臣之权，其君危如缀旒；重臣之重，其国安如泰山。耶律隆运因缘中官，策立明睿，镇服中外，无有邪谋，不可谓之非权臣，亦不可谓之非重臣也。”

前人对他的这些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6）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耶律隆运所处的时代，正是辽朝封建地主、牧主阶级的上升时期，也是辽朝走向鼎盛的时期。他本身就是辽朝统治地区封建化的产儿，是汉族